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春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35 期 (总第 137 期) 2013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癸巳年 十月十四 投稿邮箱: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高端对话:打造升级版中国市场经济系列探微

高端对话:打造升级版中国市场经济系列探微(之一)

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打造市场经济中国版本的伟大探索——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部长对话

一、建立上海自贸区是推进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

管教授:我们以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者也可以说是新阶段开始的一个宣言书,动员令。这样一个大事件,它是不是也就是像李克强总理说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个样本,一个经典。今天主要想同您讨论一下关于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几个问题。我们草拟了五个题目,供参考。

魏部长:好。
管教授:这五个题目,头一个是战略意义;后面是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第三个是挑战 TPP、TIPP 等等;再下面是关于“负面清单”的问题;最后是想从资源配置这个角度做些分析。

魏部长:上海自贸区,应该说是李克强总理审时度势,积极、科学应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变迁趋势,同时结合中国时下改革开放进程、情况,作出的中国经济下一步战略的一个落子。我把它看做是今后十年到二十年的一个战略发展实施的突破口。当然,这也是当前整个我们三中全会,十八大即将开放的下一步改革的一个试验田。

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上海自贸区仅仅是一个应对 TPP、应对 TIPP 的一个先行试点,以后将进行推广”;我也不太同意“它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的金融、财税、货物贸易、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当中单独某一项改革的一个试点、试验区。”不是说这些看法不对,也对,只是比较片面、浅显了一些。

中国当前要看到这样一个形势:自从奥巴马在 2011 年 APEC 会议提出 TPP 以后,美国对竞争、对市场经济的看法有了一个新的很大的转变——它不再提自由竞争,提什么?提公平竞争。所以当前我们国家要想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要想创造一个更好的竞争环境,要想能更大限度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实现十八大将要提出的三个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

二、权利平等与“公平竞争”

魏部长:首先是权利平等。十八大提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把十八大整个内容归纳成“一、二、三、四、五”。“一”是一个翻番,就是我们的 GDP 在去年十八大的时候 53 万亿的基础上,到 2020 年翻成 106 万亿——这叫一个翻番。“二”,就是两个同步,即国民经济的增长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同步,国家财富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第二个同步似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比如说一个杯子,虽然我们投入的成本比较多,但是我们生产率不高。相对来说可能美国生产这个杯子这需要 1 美元,我们需要 2 个美元甚至 3 个美元,就是我们的生产率不高。这就是两个同步。但是这两个都不是主要的,我认为主要的是第三个,“三”是平等,即“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四”就是四个考验,执政能力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等等。“五”就是五位一体,把生态环境建设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并存一体,叫五位一体。我个人理解十八大的这个报告里,前两个是目标,后两个是基础,而我们重要的工作途径就是三个平等。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国庆 64 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在公平面前取得成功,这是当前发出的最重要的信号。所以上海自贸区的战略意义就远远超过了我才所提的那几个看法,它不仅仅是在考虑经济、经贸金融改革范围、外向型经济、TPP 等中的某一个方面,实际上是要在这里实施一整套方案。

说到权利平等,什么叫做权利平等?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农民工;不管你是东部的,还是西部的;不管你是富裕的,还是贫困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青年,都要一视同仁,享受一样的权力。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考试就能做到这些,高考制度的创新就是权利平等。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规则平等呢?高考中,各种特长生考试能加几分,民族同志可能又要加几分,运动员也能加几分——这等于是规则不平等。当然,即使规则平等了,机会是否平等?中国这方面,由于老百姓缺少机会,所以很难形成很大的激励。比如,我们的科研成果大部分没有被转化回市场,为什么?因为要遵守部里的规定。而民营企业的科研就很多,像华为、中信等等,它们的科研成果就更



●左为魏建国部长,右为管益忻教授

《经济学家周报》去年就开始酝酿要搞一个关于打造市场经济的中国版本、东方版本的系列探讨,并且于去年年底在清华组织了两次论坛。这一次我们想集中从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切入进行探讨。为此,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部长进行了深层次交流。以下为二人的对话实录。

多地真正转化为市场上的东西了。我们特别希望能形成中国自己的东西,就好像美国的硅谷那边的企业一样——像甲骨文、IBM。更要紧的是,要给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以机会。现在年轻人在干什么呢?我们提倡创新吗?现在的年轻人却很少去创新,大多是先就业后创业再创新,但是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多出来了这个过程——年轻人需要糊口,不管他学的课程是什么,要先找个工作稳定下来。但是你看爱因斯坦也好,爱迪生也好,这些发明家、科学家,他们就有个好的环境,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的环境。他们创造出新的东西,他们的创造性的成果会有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有资金购买,然后把它们会转化成市场力,然后人才会得到尊重,才华受到重视,也会得到与能力相应的钱,最后也可能实施生产化,像福特汽车等等。这样的环境,我们中国必须要创造。我们的民营企业能竞争过一些垄断企业吗?我们的油价是不是全部实施了市场化经营?所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发展,其战略意义、作用远远不只在经济,远远不只在上海自贸区开拓的这五个领域,更在于中国,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战略发展意义。

管教授: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公平”应该说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继续发展的一个主线,一个主命题,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决定一切方面的一个关键环节——甚至全世界都是这个问题。您刚才说奥巴马不再提“自由竞争”而谈“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太重要了,它们美国也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公平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解读一切社会现象,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线索。

这些年来,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不对的。效率优先了,怎么还能把公平兼顾起来呢?必须把公平放在首位。

魏部长:是的,应该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我要和你强调的主要是公平。

管教授:过去列宁喜欢说,阶级斗争理论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指导线索,现在看来应该把公平、正义当做指导线索,否则我们共产党人办事就不得要紧。你看现在,连奥巴马都这样提了,我们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怎么能不去解决?所以我觉得您刚才列出的这个观点、问题十分重要。

魏部长:是的,比如现在许多矛盾激化到这种程度,它的关键就是不公平。我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财政部每年转移支付,这里就存在着不公平——不透明,而且不公平。干部和老百姓之间也不公平,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也不公平。光是社

保,我们就有五种:有公务员社保,有城市社保,有农村社保,有失业残疾人的社保,更多的是普通的企业职工的社保。上面提的这些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公平。我认为,下一步中国要继续发展,首先解决公平问题,而且十八大里面提出的这三个公平就是首先要解决的——“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

管教授:十八大提出的这些内容应该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魏部长:十八大有好多专家学者去解读。李克强十月一号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标题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在公平面前取得成功”。莎士比亚写许多文学著作时已经很老了,为什么他还在继续创作?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一个环境,你创造了这个环境之后,年轻人才能发挥才华,才能使他们的创新得到实践。中国是一个善于孕育文化的国家,问题现在的关键就是缺少水土丰沛的土壤,种子下去以后长不出来,水土为什么不足——就是公平竞争力不足。

三、推进改革、释放正能量,提高效率

管教授:现在看来,效率问题是个大问题,劳动效率,生产效率,以及资源监管,配置效率。

魏部长:举个例子,在商务部那边,物流曾是我管的。中国的物流经过五年努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问题是到去年为止,物流的成本占整个 GDP 比重大,中国虽然已经从原来的 23%下降到 18%,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他们都是七点几:七点五、七点六、七点八……也就是说,中国的物流成本占 GDP 比例是人家两倍都不止。为什么会有情况?你看,外环上大批的货车,但是有的车去程的时候有货,回来时是空的,甚至是去程的时候就是空跑。比如说跑沪宁线的,甚至去新疆的,回来有的都是空跑!人家美国、英国就不一样,去程时满载,回程时他通过卫星连网也同样是满载。我们大批的物流在烧 GDP,这还不包括我们公路上的收费站,不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费用、税。现在这个时代,我不太同意一些人讲的“大鱼吃小鱼”,我认为是“快鱼吃慢鱼”。当今这个时代,速度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上网还不行呢?因为现在他还没有跟上“网通”的速度。每个人都觉得某个事情需要办,但是谁能达到比人都快,谁就是先占鳌头。比如说你,采访一个人,比其他报纸更早采访到,你发表的东西别人也就愿意看,在这里面抢这个先机,新闻导向一下就上来了。速度不一样,不是说我一定能赢,不一定,但是大反而不一定是最好的。

管教授:在所有制歧视存在,国企垄断存在,中、小、微企业有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情况下,“大吃小”是很不公道的。而在这里我还想说刚才谈到的效率问题,有一个统计数字:从 1998 年到 2008 年,十年间我们劳动对于 GDP 的贡献率下降了 3 倍。现在,我们一定要大抓效率的增长,强调“手段”,而重要之点是要增长。而效率,我认为这要做一个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效率,必须明了。改革开放 35 年来,我们投入的资本、技术比重大提高了,因此效率就提高了。但是,我们人的积极性、管理、工艺流程改善状况、企业文化建设等人文效率如何呢?比如说,如何珍惜工时就是个大问题,有的国企,下午 3:00 上班,这会有效率吗?所以我想效率以后应该分两种:一种叫原生效率,一种叫派生效率——资本的效率、技术的效率等等都属于派生效率,而人的积极性,人文素质参与的效率则为原生效率。原生效率,是第一位的,决定命运的。

魏部长: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效率很高的。现在,提高效率成了一个问題。当然有机制上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个人积极性太差了,都不愿意做更多的探索。为什么那些民企,特别是民营餐饮业、服务类企业能够效率更高,因为机制。他(她)的收入,与其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结合的更加紧密。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呢?完全可以。现在的机制、制度、体系、劳动土壤、环境,还没有让老百姓觉得“我们多付出,也有更多回报”,现在有些付出多反而得到的更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医院、医患纠纷那么多。在台湾地区,病人一来,医生和病人就开始互相交流,让你感到很温暖。我们的医院缺少交流,缺少体贴,缺少关怀。所有这些我觉得都体现到机制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境地。

你是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马克思讲过这样一句话,“一切危机的真正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管教授:这句话属于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可暂且不论。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与此相联系的点是在,在这当中所引发的人文精神世界的那种影响应当高度关注。这就是人们劳动中的价值追求,一般来讲就是积极性问题。这是管理学、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全部的管理核心是研究人的积极性问题。这是我自 1989 年开始跟踪研究海尔至今,同张瑞敏若干次对话中一再探讨、形成的一个深刻的体会。严格地讲,员工们的积极性不是被调动起来,所谓积极性不是调动而是自我价值实现。积极性是人的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所形成的“正能量”,是一种自发的健康、向上的情绪流露。如果他(她)的价值没有得到实现,你无论怎么“调动”,他(她)也不会有积极性。

魏部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一个“中国梦”,“中国梦”怎么实现呢?就是要靠他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把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结合到一起,就是把自身的、个人的价值,它的实现完全体现,要和社会整个群体、民族的价值结合在一块,这个结合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难题。

四、重视软资源配置,大搞原创性的制度供给

管教授:所以,我们最近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讲资源配置时,讲硬资源配置,同时更要讲软资源配置。如果不讲软资源配置,就像您刚才说的,三个平等,那就根本做不到。多少年来我们一讲经济就是纯经济。然而把一切人文元素统统剔除干净,单一净化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制度经济学的大家康芒斯说:交易中的“愿意”,不但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法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概念。由此也可以说,所谓释放“正能量”、释放生产力,实际上是解放人的积极性。

魏部长:所以我说,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根本就是从这里突破,从人家的愿望、价值实现这里突破。我是搞外贸的。以前我们对外投资,首先是你你要投资,看你是什么公司,有没有对外投资的资质——人家从来没有搞过投资现在要做对外投资你在条件中提出他要有几年的资质,这就不对,当然现在取消了。第二,投资什么项目?是三千万美元以下的,要各省市批,是三千万美元以上两亿美元以下报发改委、国务院批,人家的投资你都不了解,那么多项目你怎么知道他这个行不行。即使批了你这个项目,你还要拿着人民币去外汇局去换,外汇区还卡着你。因为你到外面去人家不认你的人民币,现在有些地方认了,但是还是有好些地方不认。这又是一道层层门槛,层层限制。而这次搞自贸区我们就放开这个,放开之后,大家公平竞争。上海自贸区最大的意义就是体现了下一步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或是政治体系改革的一个很大的信号。

管教授:这是一种开辟未来的一个引擎

性的信号和思维。

魏部长:你不是讲一个“宣言书”吗?那个你们清华大学提出的“宣言书”。

管教授:的确,这真是我们的祖国走向更大繁荣的进军号角、宣言书。顺便说一下,1991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厉以宁先生领衔,李克强总理、李源潮副主席也参与其中的那本《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时就是我的特约编审。

魏部长:李克强总理他在辽宁的时候搞“五位一体”之时就很想在长山附近搞一个自贸区。但是搞这个自贸区必须得到国家的部委,比如说像央行、外汇局、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方面的支持,所以很难。所以说,今年 3 月 27(28)号到了上海以后,他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研究之后,上海自贸区才被提出来的。所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不是李克强总理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通过好多的探索,特别是他过去在省里面做了基础的基层工作。如何找到一个跟世界经济、跟国际规则接轨的接口,并且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一些新的规则,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是李克强总理给我们作出的一个示范。

其实,我们可以说自贸区这个概念早在以前就存在了。比如海南洋浦,再比如上海浦东。浦东新区是 1992 年为了造汽车,在上海浦东就有了这个 FT——不是 FTI,而是 FTZ, FTZ 就是简称。实际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自贸区差不多有 1200 多个,单单是美国自己各州市搞的自贸区就有几百个。发达国家搞的自贸区大概有 300 多个,发展中国家、25 个新兴国家也有 400 多个,美国自己各地州差不多又有 300 多个。但是能够真正搞成功的不多,这里面有以加工贸易货物为主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也有一些以转口的货物贸易的、免税的,比如说阿联酋的迪拜的杰贝·阿里。杰贝·阿里当时找过我,他们愿意拿一美元一公顷的土地来吸引外资。当然这个自贸区不管怎样开展自由贸易,最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在区内作为贸易、加工贸易,比如说爱尔兰的香依开发区;还有一类就是说作为货物的转口,比如迪拜。而中国上海的这个自贸区就大不一样了,这实际上是借助自贸区的形式,在这里面实行的是比自贸区更广泛、更高级、更有深度的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社会、金融、政治甚至货币的改革。这是国内外都没有的,是破天荒的一次。我认为这是中国十八大以后一个重大的举措,所以上海自贸区叫做试验区。所以我也不太同意这样一类观点:“以后自贸区,有一个再批一个”。我认为自贸试验区就是这个,以后也不会再批了。其他想要做自贸区的城市,就是把它的经验拿过来,复制。要是再批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你可以报,比如说天津、广东、大连、青岛、厦门,但我觉得不可能在上海之后再被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了。在上海揭牌的时候,我做第一财经电视直播的主持嘉宾。我说上海自贸区就是当兵兵,上海是没有什么优惠政策的,就像我们打仗一样,兵兵是在前面排雷,要做出牺牲的,然后排好雷之后后面的大部队才能跟着上。上海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它的任务很艰巨,压力也很大,更不像外面所讲的上海自贸区有很多优惠政策。所以 28.78 平方公里这块到底能不能够做好,我觉得非常关键。

管教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显然,我们在上海办的这个自贸区与世界多国已办的那些自贸区不同。它体现着人类资源配置的一种质的飞跃,应该说这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高级形态。

魏部长:是高级形态的,包括各种资源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管教授:是全方位的、大视野的、大纵深的资源配置,是市场资源配置形态的一场革命。

魏部长:所以,要看到这些,才能体会到是我们的战略意义所在。

(下转 02 版)

本报将举办“2013 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举办“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战性、时效性、前瞻性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踊

跃参评。新送参评(参考)作品请发至本报投稿信箱,来稿请注明“参评参考作品”。邮寄作品请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东区一号楼 113 室,邮编 100081。参评稿收稿截止日期(以发送日期和邮戳日期为准):2013 年 12 月 31 日。